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图书馆

吴泉成*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藏书文化,同时也有自身局限性,而近代列强的入侵也使中国藏书事业日渐衰落。随列强来华的传教士不仅把欧美近代图书馆引入中国,而且还带来外文文献和翻译西书扩充图书馆文献资源,引入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方式,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中国藏书文化源远流长。《史记》记载,老子曾任“守藏史之史”,《汉书·艺文志》亦云老子作柱下史,博览古今书籍,可见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就有了专门收藏图书的地方。中国古代藏书主要分为官府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和寺院藏书。官府藏书以皇家藏书为盛,皇家藏书馆是中国古代级别最高、藏书最为丰富的图书馆。明清时期,皇家藏书达到顶峰。明洪武至永乐时期,分别在南京和北京建有文渊阁,藏有《永乐大典》以及其他珍本秘籍。清乾隆时期,不仅重建文渊阁,主要收藏《四库全书》,又陆续建成文源、文津、文溯三阁收藏其他古籍善本。皇家藏书馆既得益于统治者对中国古代文化和典籍的重视,也体现出皇家图书馆的规模之大。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应天书院(河南商丘)和嵩阳书院(河南登封)为例,不仅是授课讲学之所,而且都设有御书阁、藏书楼,所以书院既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也是一个较大型民间图书馆。私人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的有益补充。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文人雅士多喜收集图书,且以藏书方式为主,名为“藏书阁”或“藏书楼”,明朝嘉庆年间卸任官员范钦所建的“天一阁”,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此外,中国古代很多寺院也

* 吴泉成,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外关系史。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大都设有藏经阁,多收藏宗教典籍。

中国古代多样的藏书类型和丰富的文化典籍,反映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繁荣和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然而,中国古代藏书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第一,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脉,所以这些藏书楼的藏书大多以儒家经典,如经、史、子、集为主,或者因宗教事业发展而收藏宗教典籍,而法律类、经济类、政治类的图书不多见,自然科学藏书更是少之又少。第二,中国古代藏书本身耗费巨大,所以大都是官方或家资殷实者在从事藏书活动,“多个人私藏,传子代孙;或宫中秘本,作为珍玩,少有为公用者”^①,社会下层和普通民众既无法负担藏书的开销,更无缘接触到这些藏书,因此藏书大都受用于官宦富贾,而无法惠及下层人民,也不可能实现其公用性。

一、来华传教士引入近代图书馆

鸦片战争以后,皇家藏书因列强入侵而毁于战火,大量珍贵藏书被焚掠一空,其他藏书机构也相继破落,藏书纷纷散佚或是辗转流转,更有甚者流落海外,繁荣兴盛的中国藏书事业日趋衰落。随同列强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不仅进行传教活动以传播“福音”,而且通过编书、译书,亦或是在教会和自办的教会学校设立图书馆,把欧美近代图书馆的理念引入中国。1807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传教,并著有《外国史略》,介绍了葡萄牙、荷兰、法国等国家的图书馆状况,开启了来华传教士向近代中国引入图书馆的进程。之后,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翻译的《文学兴国策》(*Education in Japan*)介绍了欧美的近代教育、女性教育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韦理哲著有《地球图说》(*Illustrated Geography*)、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编写了《美国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等介绍了欧美国家历史、教育和图书馆的发展状况。

来华传教士为了扩大教会在中国的影响,在教会中设立图书馆,收藏宗教图书。1847年,上海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建修书室,又称“汇堂石室”。据胡道静在20世纪30年代时的记载,徐家汇藏书楼“(中文图书)列架100余,每架12个格,分列经、史、子、集、丛书、圣教书,共约12万册。……(西文图书)书架亦列架100余,每架20格。有希腊、拉丁、英、法、德各国外文图书,古本书甚多,各国所出的著名百科字典及重要杂志均备。共约8万册”^②。1849年,西方侨民在上

① 杜定友:《图书馆与市民教育(市民大学第一期讲义录)》,广州市民大学出版部1921年刊印,第4页。

②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抽印本)》,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刊印,第57~60页。



海租界自发建立书室,即“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图书馆创办之初,“经费主要来自图书馆会员,只对会员提供图书借阅服务。收藏图书 1276 册,报刊 30 余种”^①。后因经费不足,上海图书馆向上海工部局求助,遂逐渐转为“公众图书馆”,并更名为“Public Library, S. M. G”,即工部局公众共图书馆。1871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伟列亚力在上海创办“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图书馆”,不仅藏书“约 1300 册;到 1930 年前后,其西文藏书有 1.5 万册,中文藏书 1000 册”^②,还收藏了关于中国和远东地区的报刊、纪要等杂志以及一些珍贵的原始文献、档案,是当时研究中国与远东地区的重要资料收藏地,被誉为“中国境内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

随着教会图书馆的规模不断扩大,来华传教士在自办的教会学校也陆续设立图书室,如裨治文夫人伊莉莎创办的贝满女学(1861)、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创办的格致书院(1874)等教会学校设有图书阅览室,供学生学习使用。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自办尚贤堂(1894),设有藏书楼,专收中西文献。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相继创立教会大学,如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的登州文会馆、美国监理会创办的东吴大学、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都设有学校图书馆,不仅购入大量的西文图书,还收藏了诸多中文图书。为了适应教会大学的教学需要,图书馆的馆藏建设不断完善,藏书量在不断增加,以上海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为例,“1915 年时,中文收藏 1657 册,而西文则为 3623 册。1923 年时中文收藏 3587 册,而西文则为 19762 册。1933 年时中文收藏 5773 册,而西文则 30112 册”^③。

来华传教士通过著书立说,或是设立图书馆,不仅把近代图书馆理念引入中国,而且把近代图书馆的模式,如公共图书馆、专门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移植到中国,扩大了近代图书馆在中国的影响,也为近代中国创办图书馆提供了参照。

二、引入和翻译西方文献,扩充图书馆图书资源

来华传教士不仅把西方近代图书馆带入中国,而且还引进和翻译西文图书文献、创办报纸杂志,扩充了图书馆的图书文献资源。传教士来华时携带大量西

① Kuang-Pei Tu, *Trans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and Values: The Shaping of Library Servic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Press, 1996, p. 91.

② 胡道静:《上海图书馆史(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抽印本)》,上海市通志馆 1935 年刊印,第 45~46 页。

③ 孟雪梅:《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书馆文献收藏特点分析(上)》,《大学图书馆学报》2007 年第 3 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文图书文献,图书内容丰富多彩,涉及宗教、法律、经济、西医学、伦理、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同时,还有国外教会组织的大量捐赠图书,如英国外务圣经会捐赠给清华书院包括希伯来文、希腊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荷兰文等大量欧美图书文献。

此外,来华传教士还不断翻译西书。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不仅创立了博济医院(1859),还翻译了大量西医学著作,如《西药略释》《内科全书》《眼科辑要》《皮肤新编》等^①;英国传教士合信不但医治病人,而且还翻译了《全体新论》《西医论略》《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等西医书籍^②。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不仅在京师同文馆担任教习,而且翻译了多本西书,如《万国公法》,为近代中国引进国际法学科。法国传教士毕利干翻译的《法国律例》,将西方近代民法引入中国。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傅兰雅独译或与他人合译科学著作达100余种,如《决疑数学》介绍了西方概率论,也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概率论的中译本。不仅如此,在傅兰雅倡导下,上海成立了益智书会(1877),其主要任务就是编译教科书。益智书会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专业水准的西方自然科学教材,促进了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发展。

此外,来华传教士还创办了大量西文和中文报刊,西文报刊有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裴来尔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英国商人和传教士的《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等,中文报刊有德国传教士郭实腊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英国传教士湛约翰的《中外新闻七日录》、美国传教士玛高温的《中外新报》、嘉约翰的《广州新报》、丁韪良的《中西见闻录》、林乐知的《教会新报》(后改为《万国公报》)、《益智新报》等。

来华传教士带来的西文图书,成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外文图书;经来华传教士翻译的西文图书,亦是近代较早的一批有关西方政治、经济、法律、自然科学和西医学等图书、教材的中译本;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中、西文报纸杂志,虽然其中有些报刊带有浓重宗教色彩,亦有些报刊为列强侵华服务,但是把近代报刊这一传媒形式引入中国,成为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同时,这些中、西文图书和报纸杂志保存在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或是之后流转到近代中国本土建立的图书馆,既扩充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也是近代中国“西学东渐”重要的图书文献资料。

① 参见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广州岭南大学1935年刊印,第17~20页。

② 参见陈邦贤:《中国医学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191页。



三、教会大学专业图书馆的出现

传教士来华后相继创办了不同类型的教会学校,学校中多设有图书室。随着教会学校逐渐演变为教会大学,原有的图书室升级为图书馆,如《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概况》记载:“本馆发轫之始,在一八六八年(即前清同治七年)其时只有登州文会馆藏书室之名。”^①有些教会大学偏重于某一学科,出现了专业性学科的图书馆,如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1917);有些教会大学中的专业学院出于教学和学科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学院图书室升级为图书馆分馆,如金陵大学的农业图书研究部(1924)。这些教会大学专业图书馆既有美国教会或基金会的扶持,又由有图书管理经验的美国人管理,对图书馆的发展大有裨益。

北京协和医学院成立之初,只有藏书量不多的图书室,并无专业图书馆。1917年,经美国罗氏驻华医社(Rockefeller Foundation, China Medical Board)帮助下,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立图书馆。在图书分类法上,图书馆初期采用十进杜威分类法,后改用美国波士顿医学图书馆分类法;杂志则是采用先分类别,再以杂志字母顺序分配号码。^②图书馆建立之初,“图书杂志一部分来自传教士捐助,一部分来由美国波士顿医学图书馆包拉德氏(Ballard)代为采购”^③。随着医学院教学发展的需要,图书馆不断收录中、西文医学图书典籍,如中文图书有《汉译临床医典》《中国医学书目》《中国医学大辞典》等,西文图书有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y*、*The Dentists Register* 等^④,其中有些医学西文图书极其珍贵。此外,中、西文医学杂志收录亦是丰富,如 *British Medical Journal*、*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等。^⑤据图书馆学家李钟履在1933年统计,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中西文图书有17923册,中文图书907册,订本杂志28470册,小册子7300册。^⑥在图书、杂志的流通上,不仅有严格的借出手续,凡是借出图书杂志均要填写“借出登记片”,而且规定了借出数量,对逾期者不但要发出两次“追书片”,严重者还要予以罚款。此外,对图书馆际互借、交换、捐赠以及医学院和图书馆相关文件的保存均有详细的规定和记录,还先后聘任有图书管理经验的

① 《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概况》,本校印刷事务所1936年刊印。

② 参见李钟履:《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况实录》,《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第2期。

③ 李钟履:《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况实录》,《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第1期。

④ 参见李钟履:《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况实录》,《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第3期。

⑤ 参见李钟履:《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况实录》,《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第3期。

⑥ 参见李钟履:《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况实录》,《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第1期。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美国人担任图书馆主任。^① 丰富多样的医学图书文献馆藏和科学的管理模式既使北京协和医学院图书馆成为当时教会医学大学专业图书馆的翘楚,也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发展和培养近代医学人才的重要依托。在近代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医学院中,北京协和医学院有着“南湘雅,北协和”的盛誉,医学院图书馆的建设则功不可没。

1914年,美国来华传教士裴义理在金陵大学开设农科,后改为金陵大学农学院。裴义理不仅聘请美国农业学专家来华任教,参照美国大学农业教育模式建立了金陵大学农科的教育课程体系,还设置了农业图书研究部。为了推动农业学科教学的发展,农学院不仅从欧美国家引进农业学相关珍贵图书文献,还获得美国罗氏基金等机构的捐赠图书、植物标本。同时,收集整理中国古代农业史料,“分类辑成《中国农史资料》456册,《先农集成》收录资料1000于万字,《方志目》收集2104种,校正《农业书考》《古农书校刊》等,编辑《农业论文索引》”^②,等等。同时,还创办了《农林新报》等农学报刊和《学校苗圃须知》《养鸡须知》等农业知识手册,促进农业知识推广和农业教育的普及。丰富的农学图书文献和农史资料既使金陵大学农业图书研究部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农学专业图书馆分馆,也为金陵大学农学成为当时国内一流的农学专业起到重要作用,为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中国近代农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人才。

来华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大学中设立专业学科图书馆,既有助于教会大学有针对性地收集专业图书文献资料,更是学科专业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对培养中国近代专业人才起到重要作用,也为中国近代专业图书馆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藏书文化,各类文化典籍浩如烟海。然而,中国古代藏书“重藏轻用”,“只知保守而不能开放,惟皇室贵族与士大夫阶级始有博览群书之机会,平民无与焉”^③,加之遭遇近代列强的劫掠和战火,中国藏书事业日趋衰落。近代来华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不仅把西方近代图书馆引入中国,也把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机制和图书分类方法一并移植过来,而且还引入诸多西文图书,翻译了大量的欧美近代图书文献资料,充实了图书馆馆藏资源,更是建立起实力雄厚的专业学科图书馆。不仅如此,来华传教士创办的不同

① 参见李钟履:《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况实录》,《图书馆学季刊》1934年第1期。

② 鲁彦:《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科研措施及其成就》,《古今农业》2005年第1期。

③ 沈祖荣:《图书馆学大辞典序》,丁道凡编:《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0页。



类型的图书馆也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窗口,更使中国近代一批有识之士意识到图书馆在开启民智、人才培养和社会研究等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而开始创办中国自己的图书馆^①,推动了中国由古代藏书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促进了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来华传教士创办的近代图书馆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参见梁启超:《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1899年5月1日《清议报》。